

張學良 與中國

〔日〕

松本一男

著

王枝忠

魯忠慧

譯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张学良与中国

[日] 松本一男 著

王枝忠 鲁忠慧译

(内部发行)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208号

责任编辑/宋焕起

封面装帧/滕 之

张学良与中国

[日]本松一男 著

王枝忠 鲁忠慧 译

(内部发行)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外花园村)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科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625 字数:111千字

199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100册

ISBN 7-81014-590-8/K·14

定价:2.50元

中文版序言

一般日本人对于“西安”这个地名，因为两个原因，保持着深刻的印象：

一、西安即过去的长安。隋唐时代长安是文化、政治的中心，中国周边的异民族国家时常朝贡。当时日本派遣许多“遣唐使”到长安学习中国文化，发生密切关系。譬如日本的京都就是模仿长安而建造的，日本人称为平安京，那个时代叫做平安时代。

二、“西安事变”的发生地。西安的枪声打破了当时全世界人民的酣睡，至今已过了50多年。本书就是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将军的传记。虽然说是传记，可他仍然活着，现住台湾台北近郊。

自从1936年12月25日以来，张学良从他那个生气蓬勃的政治舞台走下来，“张学良”这三个字似乎从人们的脑子里消失了。因为兵谏成功之后，他跟蒋介石一起到南京，从1936年12月26日被幽禁到今天。在这50多年间，中国起了大变化。当年的“天下人”蒋介石与其一伙被中国共产党赶下台，逃到南海的孤岛台湾。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也有近半个世纪的日子过去。由于西安事变，中国转变了他的命运。

就张学良个人来说，这50多年是时间与历史均停止的期间，因为他一直被夺去自由，被禁在囹圄。19世纪法国作家杜马的《岩窟王》（Alexandre Dumas: “le comte de

Monte-Cristo”)里，主角被幽禁十几年，因此引得读者落泪。但事实更比小说奇怪，张学良却被幽禁50多年。由此可见，政治是多么残酷，权力是多么空虚。“被忘掉的浪漫子”张学良的名字再次浮现出来是去年的事。1990年6月4日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台湾国民党政府主办“张学良诞辰90年”的典礼，党、政、军要人200余名参加祝贺。中国大陆邓颖超女士亦致电庆祝。表面上看来，张学良由此日得到自由。席上的张学良岁寿90，颇为矍铄。此翁虽是白头，依稀往日“东北的公子”。同日他说：“如果国家还需要我，我可以自策老躯，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幸福而奋斗到底。”

1989年10月间，张氏出现于日本NHK（放送协会）电视，与东京都知事候选人矶村尚德畅谈。他神情活泼，身体健康，头脑明晰，看不出90岁的年纪，“不愧是往日的抗日英雄”。他作为90岁的老人，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再登上舞台呢？莫非是暗中有些谋略吗？一定不是偶然。不管怎样，最近大陆与台湾的互相往来日趋活跃，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与和解的日子似乎不太远了。曾为不共戴天的东德和西德已经统一了，难道中国大陆与台湾永远敌视吗？由此看来，这个被忘掉的少帅将有再登上舞台的可能。

拙著承蒙王枝忠先生等译成中文，在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实在是无比光荣的乐事，谨此竭诚致谢。

松本一男

1991年2月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松本一男
一、东北王子——父与子	(1)
1. 马贼之子	(1)
2. 早年的朋友	(7)
3. 五四运动的冲击	(13)
4. 亲日派和抗日派	(19)
5. 相互妥协的父与子	(28)
6. 老师炸死	(34)
二、年青领袖——与蒋介石的争执	(43)
1. 奉天的青天白日旗	(43)
2. 扫除绊脚石	(50)
3. 挫折——对苏冲突	(53)
4. 声望提高	(62)
5. 满洲事变前夕	(68)
6. 不抵抗的败退	(79)
7. 脱离战线的一年	(89)
三、抗日英雄——西安事变真相	(96)
1. 统一乃民声	(96)
2. 东北军与西北军	(102)
3. 响彻西安的枪声	(109)
4. 被囚的蒋介石	(121)

5. 实现“停止内战”.....	(130)
6. 对政变的审判.....	(136)
四、被囚禁的偶像——光明与黑暗	(142)
1. 监禁与流浪.....	(142)
2. 从大陆到台湾.....	(153)
3. 半个世纪的幽囚.....	(164)
参考文献.....	(170)

一、东北王子——父与子

1. 马贼之子

张学良，字汉卿，1901年生，是旧满洲军阀张作霖的长子。

张学良出生时，其父29岁，是马贼头子，横行于满洲各地。那些马贼里面有后来任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有终生效忠于张作霖的远房本家张作相，还有盘踞于南满、河北的军阀汤玉麟。

张作霖是辽宁（当时称奉天）省海城县人，所以张学良也称自己的原籍是海城，其实他从来就没有在海城生活过，他大概是在其父的哪一个盘踞地来到人世间的。

张学良对父亲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但对母亲却所知甚少。多年以后，在他的自传中，对其父的情况谈得非常详细，却只字未提到母亲的事。作为盗贼首领，张作霖身边当然会有许多女人，张学良的母亲显然只是其中的一个。根据张学良的回忆，其母是在他虚岁11岁时去世的。

千金之子

张学良出生二年后，张作霖洗手不干马贼营生，投归了当时清政府在各地创办的洋枪队，并被任命为大队长。这支队伍称为新民巡防军，司令部设在奉天（现在的 沈阳）。新民巡防军对大名鼎鼎的马贼头领张作霖是待如上宾，优礼有加，很快便擢升他为奉天前路统领，相当于旅长。于是，他便统领 7 个大队的步、骑兵驻防南满。

有关自己的少年时代，张学良曾经这样说过：“人们都说小时候被过份娇惯的孩子不会有大出息，在我的孩提时代，也深得父亲的宠爱，被视为掌上明珠而极其娇惯。不过，我虽然狂妄傲慢，却是个聪明的孩子。”

成年后的张学良可以说是中国典型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汽车自不必说，他甚至还有飞机驾驶执照，这是很能得到女性青睐的。他的生活可以说无拘无束，随心所欲。他接受的是欧式教育，却学会了抽鸦片，自甘堕落，终日沉湎于酒色和吸毒、赌博之中。这种腐朽的生活应该归咎于他小时候备受溺爱的环境条件，正如他自嘲时所说的那样：“在过份娇惯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是不会有有多大出息的。”

唯一可以自豪的是，他的确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所以他得到了其他同母或异母兄弟姐妹所没有的疼爱和照顾。他配有汉学、洋学和武术家庭教师，生活习惯全部模仿西方贵族子弟。绿林出身的张作霖自己目不识丁，希望继承自己事业的儿子不仅有传统的儒学功底，而且还受过良好的西方

教育。

张学良一出娘胎就注定了他将要担负起东北王的重任，因此，随从们都称他为“少爷”。这只是旧中国贵族和有钱人家的子弟通行的尊称。所以当张作霖后来占领了满洲和北京一带，自封为陆军元帅以后，一班溜须拍马的家伙和摇笔杆的记者便恭维地改称张学良为“少帅”。“少帅”二字按字面解释是“年青的元帅”。可以说，那些人已经把阿谀奉承的话都说绝了。

清朝覆亡

就在张学良出生的1901年，清朝政府缔结了一份条约，它旨在处理二年前爆发的“义和团事变”（高举“扶清灭洋”大旗的义和团发动的反对西洋的暴动）。这时的清王朝已是奄奄一息，西欧列强和东洋日本都轻蔑地戏称她“不是睡狮，而是恍惚徬徨的猪”。清朝统治已经日薄西山，一步步走向灭亡。上海、广东、天津等处门户被打开，并沦为外国的租界，这是列强们对中国竞相动武开始得到的甜头。紧接着，1902年，英国在各个城市建立起自己牢固的据点；1903年，英国侵略西藏；1904年，占领了满洲的俄国和日本发生冲突（日俄战争）；1905年，法、德、美等国先后在上海、广州、天津、北京、青岛等地建立了稳固的据点；1908年，慈禧太后驾崩，在醇亲王摄政辅佐下，宣统皇帝即位；1910年，日韩合并，英、美、德、法四国成立“对华借款团”。至此，中国实际上已经沦为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半殖民地。

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通过“对

华借款团”引进外资。作为这项计划的第一步，政府为要收买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向英、美、德、法四国贷款六百万英镑。其实这两条铁路在民营期间效果并不坏，所以沿线民众便批评政府将它收归国有其实是将民有财产拱手送给外国人的卖国行径，于是起而抵制。其中四川、广东、湖北、湖南等地的反抗尤为激烈，屡屡发生暴力行为。

本来，中日战争失败以后，全国就已经形成以汉族为主的“如果不打倒清政府，进行一场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就必定灭亡”的大势。现在又以政府向外国借款为导火线，点燃了熊熊的燎原烈火。

1911年10月10日半夜，在革命运动据点的武昌城，革命士兵们发动起义，迅速占领了武汉三镇，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宣布独立。武昌革命很快波及到其他各省，到了11月，包括河南、直隶和山东一部份在内已有十多个省，也都宣告独立，全国三分之二以上地区都举起了反清大旗。

12月，宣布独立的各省代表会集上海，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选举从美国归来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取代帝制的民主共和国就这样诞生了。通常都称之为“辛亥革命”（辛亥是1911年的干支），又把爆发革命的10月10日称为“双十节”，定为建国纪念日，它至今在台湾仍然被国民政府这样对待。

张作霖的崛起

辛亥革命那年，张学良还是个只有10岁的少年。以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四大政策为基本纲领的革命力量的活动，对这位聪明敏感的少年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影响。张学良想了解更多地了解革命活动的情况，不断地向父亲、老师问这问那。其父见眼前这位还是个孩子的儿子竟然也受到这种危险思想的浸染，产生了戒心，于是，凡为“少爷”所关心的事情，那些家庭教师都只好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其实，张作霖和家庭教师们对有关革命的事情也都很无知，他们自己也都不清楚该怎么评价辛亥革命。

不过，不管张作霖这些绿林出身的武夫们怎么看待，革命浪潮却已经迅速地冲击了东北三省。当时的奉天总督赵尔巽看到形势不稳，便准备依靠守旧派军人手里的地方巡防大队来镇压革命派。张作霖察颜观色，猜到了总督的意图，他喜出望外地欢呼：“机会来了！”便率领自己所辖7个大队进入奉天城内，会见赵总督，请求将奉天的治安任务交给自己。惯会顺水推舟的赵尔巽马上任命他为奉天守备司令，并又将8个大队的人马拨归他指挥。这样一来，他手中便控制了15个步、骑兵大队，实际上已经成了奉天头号军事领袖。

马贼和山贼头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勇猛、果敢、不怕死，但头脑简单，不大懂政治。唯有张作霖与众不同，他对政治很关心，野心勃勃。因此，他决不满足于只是当一个马贼头领或者地方土军阀。他常常注意揣摩上峰的好恶心思，抓住时机往上爬。从他攫取奉天军事大权的行为，便说明了这是一个城府很深，极有心计的军阀。

力图在政治舞台出头露面的张作霖，在还没有成年的张学良眼中印象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不管他是反感还是钦佩，这个时期乃父的想法和做法，在这位有着一双圆溜溜眼睛的少年张学良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

痕。

称霸南满

1912年，张作霖的人马被改编为陆军第27师，师长嘛，当然非他莫属。

1915年8月，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一方面密谋复辟帝制，一方面为了控制满洲，便任命其嫡系段芝贵为奉天督军。本来就不占地利、人和优势的段某人，抓到军权之后想把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却急于求成，和各部长官由互不信任发展到抵触、对立。那些长官不服气地认为：“这家伙刚从北京来，又不了解地方的实情，有什么资格对我们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这时，置身对立的两派之外冷眼旁观的，是善于钻营的张作霖。作为各部长官顶头上司的他，在背地里煽风点火，挑唆这些人对段不满，同时又暗地派人向北京的袁世凯密报段芝贵无力服众，请求换马。

袁世凯心中也十分清楚，奉天军部的幕后人物是张作霖。清王朝倒台后，中央政府的地位决不是坚如盘石，实际上是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至少遭到旧同盟会的宋教仁、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国民党的孙中山等诸多势力反对的袁世凯，极不希望再在离北京不远的奉天地区出现反对派。他准备采取“以夷制夷”的手段，便在1916年4月召回段芝贵，而提名张作霖为奉天都督兼省长。

这样一来，张作霖实际上已是南满之王。他从结束绿林

生涯，投归官军之后到此时，才只经过了13个年头。

父亲成为奉天军政界最高首脑的时候，张学良15岁，随着张作霖地位的不断高升，张学良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了。在自由自在的生活中，他反而产生了孤独之感。张学良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虽然我很受宠爱，但由于父亲整天忙于军政大事，我们难得有坐下来悠闲地闲聊几句的机会。于是，孤独之神在我的心中悄然降临了。我渴望向哪位值得尊敬的大人诉说心中这种朦朦胧胧的想法，但是，除了父亲之外，我找不到第二个可以一吐衷曲的人。”

2. 早年的朋友

张学良15岁起开始出入奉天的基督教青年会。在这里，他结识了同以前围绕自己身边的奉承者和秉承父亲意旨的家庭教师迥不相类的一批人。

在基督教青年会结交的朋友中包括美国青年约舍夫·普拉特和王卓然。普拉特是基督徒，而且很虔诚。他是一位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青年和平主义者。王卓然年纪较大，是一位担任中国东北大学代校长的青年知识分子。张学良这时所结交的朋友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1) 张学良虽然是奉天军政界最高首脑的公子，但并没有得到特殊的待遇，大家是和他以同辈的朋友身份进行平等交往的；

(2) 爱好和平，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气氛；

(3) 共同感兴趣的是军事以外的知识；

(4) 深为中国社会的积弊而焦虑不安，都抱有改造社会

的崇高理想；

(5)虔诚信奉基督教。

一句话，张学良新结识的年轻朋友们的思想和理想，与他父亲的想法相差甚远。通过和这些人的交往，张学良逐渐发现，父亲和自己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人群里，而且都乐此不疲，无法离开它。

复辟帝制运动

张学良16岁时，其父让他加入了督军近卫队，以见习军官的资格任奉天军司令部的勤杂人员。张作霖让儿子在自己身边当差，是要借以让他历练行伍生涯的基本情况。二年以后即1919年4月，张学良被正式任命为近卫队第二连连长。

辛亥革命那一年，张学良还只是10岁的少年，虽说也感受到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气息，但只是到他成年前的几年里，才比较清楚地看到祖国那受尽帝国主义列强欺侮的可怜形象。

袁世凯镇压了华南、华中的政敌，巩固了北洋政府的统治以后，越来越专横独裁，最后竟然要逆时代潮流而动，妄图复辟帝制。为此，他在内政方面提倡“尊孔读经”，这自然首先要在教育领域制造帝制运动的舆论。在外交方面，1915年与日本缔结了“二十一条约”，以换取日本对自己复辟帝制的默认。另外，还让御用的美籍学者古德诺发表美化帝制的言论，于是欧美各国那些老于世故的学者也假惺惺地表示赞成中国恢复帝制。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与中国利害关系密切的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等列强们，经过商讨，对中国采取了严守中立、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但也并非抱着希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友好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保住各国在华的既得利益不得已而采取的苦肉计罢了。待到1913年4月，日本、英国、俄国、德国和法国五国，看到新的民主政府成立后，政局已暂时稳定下来，就共同贷给袁世凯政府2500万英镑的巨款。作为报答，中国政府向上述五国以自己的盐税作为担保。这是极为苛刻的条件，这样做的结果，可以说中国的财政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列强所控制。由于借款条件过于苛刻，就连美国都不参加这个借款团。

袁世凯的这种卖国行径激起了国内有识之士的愤慨，他们认为这威胁着国家的独立，便掀起一场反对运动。但是，掌握着军权的独裁者袁世凯硬是用武力把社会舆论弹压了下去。

袁世凯之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都忙于欧洲大陆的战事，无暇顾及亚洲，中国大陆似乎出现了短暂的美好时光，日本帝国主义便乘虚而入，加紧侵略中国。1914年11月，日本赶走了青岛德军，将从济南到青岛的胶济铁路沿线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到了第二年，日本的大隈重信内阁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实现前面已经说过的个人目的，在这一年的5月7日竟然签字接受这个屈辱的条约。

在“二十一条”里：

(1)有关在山东的权益四条；

(2)有关在南满和东部内蒙古的权益七条；

(3)有关在汉冶萍公司（湖南省最大的铁矿开采公司）的权益二条；

(4)有关不割让港湾岛屿的一条；

(5)此外还有日本所希望的条款七条。

这不是很露骨地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么？例如第(2)项中，把关东州的租借期和南满铁路（满铁）的经营期延长到99年。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99年”是被视为半永久性的期限，因此，它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对关东州和满铁享有半永久性的占领权。

如果“二十一条”都付之实行的话，中国大概要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此，中国国内当然会发生猛烈的反袁风潮。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外交上的失败和国内的对运动，强行登基当皇帝，宣布将1916年改为中华民国洪宪元年。但是，全国民众和其他军阀都不承认。三天之后，云南的唐继尧、蔡锷举兵反对，此后西南各地立即响应，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东、武汉等大城市连日举行抗议游行，“打倒卖国贼袁世凯”的呼声，响彻全国各地。

袁世凯被日益高涨的反抗呼声吓破了胆，赶紧在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经过这场惊吓，袁世凯这个野心家终于病倒在床，并于这年的6月在北京去世。据说当时中国人民敲锣打鼓，欢呼：“这是老天爷的惩罚！”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副总统一职则由直系军阀冯国璋担任。直隶就是以北京为中心的现今的河